

新中国怎样解决历史遗留边界问题

□ 曲鹏飞

中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邻国众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疆域范围随着国势消长不断变化，在国家统一、国势强盛时，中国的疆域范围和边疆治理力度就大一些；反之，则疆域收缩，治理松弛。中国今日的版图奠基于清朝。清朝沿袭以往历代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建立起朝贡体系，为“天朝”树立“屏藩”，笃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明确国家四至疆界不以为意。中国的领土主权意识和边界观念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疆土不断萎缩，与邻国的大部分边界没有有效划定，对边界也缺乏有效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划界问题成为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这个新生政权妥善解决。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邻国的陆地边界处于三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历史条约”（如中俄、中越边界），中国政府曾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过边界条约，划定过边界线，甚至在有些地段还竖立过界标，但是由于条约文本缺陷、地理勘测技术落后以及随时间推移造成的地标不清、灭失等原因，部分边界仍然存在大量的争议；一种是“传统习惯线”（如中尼、中蒙边界），中国与某些国家的边界没有见诸于条约的正式划定，但是历史上两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基于双方行政管辖实际范围的习惯边界线；一种是“实际控制线”（如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历史上有关国家非法越界占领中国领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军队奉命进驻边疆，解放军与外军对峙的地区形成了实际控制线。

面对复杂的边界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采取了慎而又慎的态度。建国初期百废待兴，

新中国在边界问题上一度采取“维持现状”的总方针。1955年11月，中缅边防部队在中缅边界南段爆发武装冲突，引发“黄果园事件”。西方国家借机炒作“中国扩张论”，煽动中国周边国家加入美西方阵营，对中国进行“反击”。“黄果园事件”使中国政府意识到划界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提出了妥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原则和办法。新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总方针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和稳妥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改善中国周边环境。中国政府决心以中缅边界为突破口，逐步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美国的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军事包围，睦邻友好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政府把解决边界问题放在国家对外战略的高度通盘考量，希望借此巩固国防，安定四邻，塑造和平的周边环境，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考虑到边界问题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全程参与并领导边界谈判，从全局出发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二）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中国政府根据边界问题的特殊性确定了一些具体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旧中国留下的不平等的边界条约。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中国政府确立了承认旧界约、以历史资料作为划界依据的原则，即清政府及国民政府同邻国签订的边界条约，一般予以承认，并以旧约为基础通过友好协商重新划界。确认这一原则，是因为当时有人提出，应该全面否认旧政府签订的卖国划界条约，以中国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最大疆域作为划界依据。中国领导人认为，这种想法不符合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国际法一般原则，只能引起中国和周边国家无休止的纠纷，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在战略上对中国很不利。划界原则必须是合理的、现实的，符合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为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和三项谈判原则。三条谈判方针是：其一，谈判的目的是要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以利于国内进行建设；其二，谈判的结果应在同亚非国家和平共处问题上起示范作用，打破美国企图压迫和利用新兴民族国家形成对社会主义国家包围的态势；其三，谈判的过程一方面要坚持和保护国家正当利益，另一方面也必须在反对大国主义方面做出榜样，使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三项谈判原则是：其一，守住应该到达的地方，即要守住解放前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地区，国民政府未能实际统治，但在法律上明确归属中国的地区也要接收，其中有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日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其二，根据历史上可以为凭的法理论点来谈判；其三，结合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及中国的外交政策来谈判。

在上述方针原则指导下，从1956年至1963年，中国同多个邻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划界问题。1960年10月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缅甸联邦边界条约》是新中国同邻国达成的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条约，在此范例指导下，中国又相继同尼泊尔、朝鲜、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解决了边界问题。20世纪60年代成为中国边界划定、勘定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划定边界的过程中，新中国和平外交战略及睦邻友好政策走向成熟，中国树立了和平外交形象，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启了

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全方位友好合作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环境变得复杂但相对稳定，中国的国家安全压力减轻，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持续改善，中国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又迎来了良好的历史契机。中国先后与俄罗斯、老挝、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目前，中国已经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签署了边界条约，中国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中，90%以上已经通过双边条约正式确认。

（三）

纵观新中国解决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进程，中国政府始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坚持通过友好协商、互利共赢的外交谈判方式，与邻国公平合理地解决彼此分歧。既坚持了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坚定性，也兼顾了谈判策略的灵活性，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划界方案。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则妥善加以管控。即使出现局势恶化，被迫自卫反击的情况，中国也坚持“以打促和”，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把对方拉回谈判桌。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目的是通过有效战略沟通，化解猜忌和疑虑，把握双边关系大方向，为自身和周边国家的发展缔造稳定的环境。这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思路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本色，为解决国际社会领土争端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加入保卫中国同盟

诺曼·法郎士是英国人，曾任职于香港大学历史学系。他不仅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为中国抗战事业无私奉献的战士。他短暂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诺曼·法郎士：为中国抗战牺牲的英国学者

诺曼·法郎士1904年出生在中国，他的父亲在英国海军工作，他的叔叔在英国圣公会教堂担任教区牧师。法郎士中学时曾在广州就读，之后就读于剑桥大学，毕业后，从1938年起在香港大学担任历史学高级讲师。法郎士在香港和中国南方的城市居住了很长时间，他经常利用假期到中国各地旅行，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会讲汉语，也会讲粤语，能书写汉字，很喜欢与中国人交往，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感情很深的学者。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宋庆龄号召爱国人士组建保卫中国同盟，呼吁国内外一切反侵略、反法西斯、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和团体参加，并努力向中国供应医疗和救济物资来支援中国抗战。在宋庆龄的号召下，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们，源源不断地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汇入到支持中国抗战的队伍中，他们为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法郎士就是其中之一。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与一批中共党员、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共同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诺曼·法郎士由他的朋友詹姆斯·贝特兰推荐参加盟盟的工作，成为盟盟的创始人之一。法郎士被任命为盟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名誉司库，负责物资的募集、运输及财务方面的工作。盟盟成员职衔前冠以“名誉”二字，意味着他们的工作都是义务的，这也是一种荣誉称号。

1941年，为加强盟盟的各项工作，盟盟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了财政、运输、宣传出版、促进4个委员会。法郎士领导财政委员会。在法郎士为香港的盟盟工作期间，盟盟做了大量的募捐工作，募集了几十万元援助款，其中绝大部分用以购买药物，主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法郎士的工作也得到了宋庆龄的认可，获得了高度赞誉。

亲自护送援助物资

1941年初，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得知，西北黄河流域地区正在流行回归热、疟疾、痢疾、伤寒等时疫疾病，许多乡村有一半的人因此丧生，许多士兵和百姓都得不到医治。那里的军民迫切需要医疗物资。在得到相关消息后，保卫中国同盟协同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外籍人士后备队等团体，拟定了一项救济方案。最终决定派出卡车车队将医疗物资运送到西北，再交由黄河沿岸的各卫生所使用。

1941年6月，法郎士以盟盟财政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积极响应和筹备物资运送工作，并亲自担任运输车队的负责人，在暑假期间率领运输队前往宝鸡。7月24日，法郎士率车队离开韶关奔赴西北，开始了护送物资的征程。10多天后，法郎士车队一行终于到达了贵阳。不料，车队在当地的军事检查所遭到了地方当局的扣押。地方当局接到重庆方面的命令，称这批物资“是给八路军的”，因而不准通过。心急如焚的法郎士随即开始向重庆的中国工合办事处发送救援电报，寻求支援。但到8月底车队仍未得到通行许可。因临近开学，万般无奈的法郎士不得不暂时离开贵阳，返回香港继续其在大学的工作。盟盟得知这些情况后，通过中国工业合作社敦促，9月2日允许卡车前往重庆的通行证被送到贵阳，以保证物资被运往西北。

为反侵略献出生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当时，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各部门都设在香港。12月8日，日本突然进攻香港，日军军机轰炸启德机场，陆军同时从福田过境进攻铜门平原。自此，香港保卫战正式展开。开战初

期，香港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一些教师被征入伍，许多学生被迫离开课堂去参加守城工作。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诺曼·法郎士自愿参加香港义勇防卫军，进入志愿队第二炮兵连担任炮手，积极投身到了保卫香港的战斗中去。

当时邻近香港的广东等省份已被日军占领。由于缺乏外援，且香港守军与日军军力悬殊，香港守军的抵抗十分惨烈。日军认为在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香港，没有料到香港守卫军的抵抗意志如此顽强。尽管守军中的很多人并非职业军人，而是教师、学生等爱国人士，却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毅力。许多地方的守军都是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放弃抵抗的，还有许多人拒绝投降，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1941年12月，在抵抗日军进攻时，法郎士不幸中弹，为香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献出了生命，当时他只有37岁。

法郎士牺牲后，他的好友詹姆斯·贝特兰将其埋葬在香港赤柱地峡的堡垒大门旁边，在那里为他竖起了一座简易的木质十字架。这位生于中国、喜爱中国文化并一生致力于为中国工作的学者，永远留在了这片他热爱并为之奋斗和奉献的土地上。

抗日战争结束后，法郎士的墓被迁至香港赤柱英军墓地。2018年，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国福利会代表团赴香港开展中福会建会80周年寻根活动，期间前往祭扫了曾在太平洋战争中牺牲的、在保卫中国同盟中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名誉司库的诺曼·法郎士。法郎士既是一位为中国抗战事业无私付出的奉献者，也是一位面对侵略者毫不畏惧的勇敢的战士。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法郎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